

許燚輝 主編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五 編 第三冊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下）

李春陽 著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許 鋌 輝 主編

第 3 冊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下）

李 春 陽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下）／李春陽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256 面；21×29.7 公分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編：第 3 冊）

ISBN：978-986-322-524-9（精裝）

1. 白話文運動

802.08

102017937

ISBN-978-986-322-524-9



中國語言文字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三 冊

ISBN：978-986-322-524-9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下）

作 者 李春陽

主 編 許鈇輝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五編 25 冊（精裝）新台幣 5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下）

李春陽 著



目

次

上 冊

序 蔣寅

序 陳丹青

緒 論 1

第一章 什麼是白話文運動——對《中國大百科全書》

「白話文運動」詞條的症候式閱讀 13

第一節 白話文運動的背景 15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的經過 28

第三節 白話文運動的成就 45

第四節 白話文運動的影響 60

第二章 白話文運動的五位先賢 65

第一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胡適 69

第二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魯迅 81

第三節 白話文運動中的周作人 98

第四節 廢名與李長之 113

第三章 白話文運動向何處去？ 147

第一節 大眾語運動 149

第二節 「民族形式」論爭 172

第三節 白話偏至論 194

第四節 白話的舊與新 215

中 冊

第四章 從立異到標新 241

第一節 「河南五論」 241

第二節 「老三篇」	258
第三節 毛澤東的寫作	289
第四節 舊詩與新詩	327
第五章 漢語文脈的斷與續	363
第一節 漢字與文言	363
第二節 古文運動與科舉	374
第三節 駢文與散文	386
第四節 簡化漢字不該倉促而行	398

下 冊

第六章 言文一致問題	421
第一節 言文一致的由來	421
第二節 言文關係簡論	431
第三節 方言和方言寫作	448
第四節 口語和書面語的關係	467
第七章 漢語歐化問題	489
第一節 歐化問題的緣起	491
第二節 歐化諸現象分析	504
第三節 對歐化的評價	516
第四節 翻譯文體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527
第八章 修辭思維與寫作倫理	549
第一節 西方的修辭思維	549
第二節 在修辭立誠和方便法門之間	571
第三節 著述傳統與寫作倫理	600
第四節 風雅久不作，何日興再起？	624
結 語	647
附錄 本書涉及的百餘年來語言文字及文學大事 簡表	649
主要參考文獻	661
致 謝	675

第六章 言文一致問題

第一節 言文一致的由來

爲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爲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只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註1〕

這句話，出自魯迅先生一九三四年題爲《漢字和拉丁化》的文章，署名仲度，初刊於八月二十五日的《中華日報·動向》，後編入《花邊文學》。上引文字未加引號，試圖突顯這兩句話在今時語境下的荒誕感——「我們」與「漢字」，只能「犧牲」一端才得留存另一端麼？

七十七年前，是哪一種勢力迫使魯迅寫出這樣的話，「如果大家還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請漢字來做我們的犧牲了。」此等決絕的念頭並不始於一九三四年。一九一九年魯迅致許壽裳信說，「漢文終當廢去，蓋人存則文必廢，文存則人當亡，在此時代，已無幸存之道。」〔註2〕這不是魯迅一人的想法，而是五四新文化一代人的共識。

〔註1〕《魯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57頁。

〔註2〕《魯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7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會發起，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六百八十八位知名人士，共同發表宣言《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文章說，「中國已經到了生死關頭，我們必須教育大眾，組織起來解決困難。但這教育大眾的工作，開始就遇著一個絕大難關。這個難關就是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難認、難識、難學……中國大眾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這種新文字，現在已經出現了。當初是在海參崴的華僑，製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實驗結果很好。他們的經驗學理的結晶，便是北方話新文字方案……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一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註3〕

與其說是新文字運動，不如說是某種隱藏其本來面目的政治運動。所謂新文字，這裏指拉丁化的拼音文字，相對於國語羅馬字，兩派在主張上大同小異，卻弄到勢不兩立。唐蘭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中國文字學》中認為，「民國二十三年跟著大眾語運動而來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一種簡單的粗糙的拼音文字，沒有四聲，所以應用時很不方便（孔子可以讀成空子），他們雖然用來寫方言，卻不能和任何一種方言符合，雖然曾經熱鬧過一陣，現在似乎已無人提起了。」〔註4〕

白話文運動在三十年代暫時停歇，繼之於大眾語運動的興起，兩者的遞進與終極目標，都是言文一致。文言作為「言文一致」的障礙而被白話替代之後，第二障礙即指向漢字。大眾語運動的歸宿是拼音化，只有拼音化，才能真正實現「言文一致」。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中有句醒目的話，「待到拉丁化的提議出現，這才抓住了解決問題的緊要關鍵。」〔註5〕後來拼音化終未實行，非不欲也，是不能也。

國語運動有兩個口號，一是「統一國語」，一為「言文一致」。「言文一致」第一步是書面語去文言、用白話；第二步是廢除漢字、拼音化。「統一國語」即定北京話為全國通用的國語。在言文一致上，國羅派和拉丁派是一致的，而言及「統一國語」，分歧就大了。一九四九年後推廣普通話，實際是國語統一的全盤實現，只不過把國語稱做普通話罷了。拼音化在此後的三十年裏，

〔註3〕 蔡元培等《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倪海曙編《中國語文的新生》，時代書報出版社1949年版，第120～125頁。

〔註4〕 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頁。

〔註5〕 《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頁。

箭在弦上，始終未發。批評漢字落後不易掌握，盲目嚮往拼音文字的所謂簡便和一勞永逸那套理論，並不複雜高深，但發表的文章數量之眾，輿論之強，反對的聲音始終不能也未敢發出來，事關民族文化之未來，沒有充分地討論，卻如大批判一般，已為最高權力機構的明令做出了準備。

想知道超越審時度勢之上的學術研究者的意見，不得不到民國著述中去尋找。一九三九年出版的《文字學概論》中，汪國鎮的看法是：「中國言文分途之利益：東西學者謂外國言文一致，便於啓迪民智；中國言文分途，不便於普及教育；此就教育工具上言之，固有一部分之理由，但細察之，則不然。章太炎於此解釋頗合；其大意謂西方文字以衍聲為主，誠便於教育；然彼以國土偏小，言語單純，故衍聲較易。我國自黃帝以來，領域日擴，當倉頡作書之始，若開衍聲之例，則各地不免以方音造字，勢必方音不同，文字亦因之而變，惟自古即今，各地均用同一之文字，是以語言方音，雖有楚夏之殊，而紙上所書，究無南北之別。故雖北極大漠，南抵儋耳（即今瓊州），方音雖異，而文字則同；團結民族，全賴乎此。彼印度版圖不下於我國，雖其文字以梵文為主，而各地依方音造出之文字，不下三十餘種，語言不下百數十種；豈若吾國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至今猶得觀同文之盛者乎？固知造成吾國國家之統一，民族之團結者，正言文分途之功也。」〔註6〕

二

郭錫良認為，口語和書面語是一種語言的兩種變體，各有其特點，差異產生的原因在於，口語通過口耳相傳，往往隨口而出；書面語是讓人閱讀的，經過認真思考才寫出。具體來講，口語大抵交際雙方共處特定的時空間的直接交際活動，有著豐富的語調語氣，聲音有高低輕重，還可借助手勢、面部表情等多種輔助方式，邊想邊說，因此可能有較多的省略，又可能出現一些重複或雜沓的句子。書面語以文字作媒介，用於傳遠傳久的交際工具，沒有口語的輔助手段，但可以反覆思考，仔細推敲，因此句子一般更加完整，結構更為嚴密，行文更加簡潔。「總體來看，兩者的關係只是加工和未加工的區別，就語言系統來說，應該是一致的。其差異主要是修辭表達、言語風格方

〔註6〕 汪國鎮《文字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第13頁。

面的，是屬於語言系統之外的東西。所謂『言文不一致』，不應該是指這種差異，而應該是指語言系統上的不同。」〔註7〕這些話從語言學意義上，闡述了「言文不一致」的合理性。

就漢語的發展史而言，在郭錫良看來，書面語同口語自殷商至西漢是一致的。從東漢到唐末，是漢語書面語同口語相分離的一段時期。處於文學語言正統地位的是駢文、古文這種仿古的書面語；而不被當時重視的譯經、變文、語錄等文體，用的則是一種文白夾雜的書面語。「宋代以後，漢語書面語存在三種情況：一是仿古的文言文，二是在當時口語基礎上進行加工的古白話，三是繼承唐代以前文白夾雜的混合語。」

這一結論得自不同時代的語料基礎，或可商榷，但若持異議，需研究正反兩面的史料據以申說。宋以後的三種狀況，第二種指言文一致，胡適為白話文尋找歷史根據，正在於此，五四白話文運動不過是擴大古代言文一致的份額，並非二十世紀的新設想和新要求。「宋元以後整個語法系統已經同現代漢語相差不遠，只有少數語法成分或句式衰亡了，五四以後新產生的語法成分或句式很少。所以王力先生用《紅樓夢》作為撰寫《中國現代語法》的資料，基本上已經夠用。詞彙方面差距較大，主要是五四前後新產生的詞多，消亡的詞是少數。」

本書討論言文一致，主要圍繞語言學上的是非而展開，但意識到這一問題自始就捲入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糾纏之中，因此亦不應以語言學範圍為限，超出部分的論述，歷史已經賦予——二十世紀中國語文運動的總目標，實際上是擴大了言文一致的範圍與內涵。語言學上的界定固然是學理上的依據，但卻未能對社會運動有更多的約束力，這也是持續不斷地有廢除漢字要求的原因。

曲解、誇大言文一致的內涵，有兩種方式，一是強求書面語和口語絕對一致，這在實行上固然做不到，亦且不可能也無必要；但「我手寫我口」，「明白如話」，包括全民作詩，皆屬於「文言一致」想當然的強行實踐，晚清白話—五四白話—大眾語—工農兵語言，是其形態的演變與極端化過程，一如白話越白越好成為白話文運動的邏輯推進，五十年代之後大量出現農民詩人、工人理論大批判小組即當作如是觀。

〔註7〕 郭錫良《漢語史論集》，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606～618頁。

另一方式是以口語強求文字與其一致。切音字—羅馬字、拉丁化新文字—拼音化，是其基本思路，概括說來，就是去漢字化。然而真正做到言文一致，方言亦須拼音，其後果是語言文字的分裂。語言文字既告分裂，國將不國，這在歐洲是有前例的，而五四英雄不以言文一致為滿足，還進一步要求西式的「言文一致」，拼音化於是成了唯一的出路。

為何第一種擴大仍嫌不足，還要推行第二種呢？這是一筆舊賬。辜正坤認為，文字一旦產生，會反作用於語言，使原有的語音模式發生偏離變化，導致音變，起首輔音、複輔音、塞音韻尾相繼失落，造成音隨字變，義隨字生的格局。愈往後，文字的作用力愈強。他說，「文字本身的獨立性要求語音的相應單一化，歷經數千年的演化之後，這個過程終於完成，漢語的抗拼合或曰抗拼音體系終於完美無缺地建構起來。漢字之演變為拼音文字的可能性也就被徹底地粉碎了。漢語的演變也就從遠古的語音制約漢字走到其反面：漢字制約語音。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視覺語言征服了聽覺語言。」〔註8〕如今，語言的聽覺功能試圖顛倒主從關係，甚至要廢除漢字。數千年來，漢語每一語音均被漢字塑造並規約著，目不識丁者開口說話，漢字的規約性同步趨隨。魯迅在《中國語文的新生》中說「我們倒應該以最大多數為根據，說中國現在等於並沒有文字」，表達的是道德義憤，而非科學判斷。即便拼音強行取代漢字，語音中已然滲透的漢字的影響，也不可能消除。

簡化漢字本應屬於第一種思路的一個環節，簡省漢字的筆畫，目的在於文字的普及與大眾化，間接地擴大書面語的流通範圍，但倉促簡化漢字卻出於第二種考慮：既然改革終點是拼音化，漢字只是過渡性臨時性的語言，不合理據似乎也無關緊要，以至未經周詳考慮，條件欠完備時就倉促實行，釀成無可挽回的後果。

要之，「言文一致問題」不僅是一個知識命題，也是一個權力命題，表面上是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關係，實際對應的恰是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深層涌動著民粹主義思潮，或曰大眾崇拜。且看一九四九年之後歷次運動，被整治清肅者無不是教授與文人，知識分子與民眾結合，是唯一正當的出路，適可對應「言文一致」運動，換句話說，被語言革命所吞沒者，正是早期語言革命的倡導者，

〔註8〕 辜正坤《互構語言文化學原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頁。

知識分子在這場革命運動中，不僅要廢除漢字，甚至還要消滅自我。

三

最早提出言文一致者，是黃遵憲，他在一八八七年完成的《日本國志》中寫道：「余聞羅馬古時，僅用臘丁語，各國以語言殊異，病其難用。自法國易以法音，英國易以英音，而英法諸國文學始盛。耶穌教之盛，亦在療《舊約》《新約》就各國文辭普譯其書，故行之彌廣。蓋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註9〕

將歐洲中世紀早期由拉丁語演成各民族語言的歷史經驗介紹給國人，此文為最早，後亦成為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的參照：

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字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國自蟲魚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為隸書，為草書。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乎？自《凡將》《訓纂》逮夫《廣韻》《集韻》，增益之字，積世愈多，則文字出於後人創造者多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有孳生之字，為古所未見、今所未聞者乎？周秦以下，文體屢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乎復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夫！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註10〕

現代中國語文革新運動——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都與這段文字關係密切。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延至二十世紀初，以言文一致為旨歸的文字改革開始了。

《馬氏文通》嘗試從文言文範圍增加讀寫的便易，並未觸及言文不一致

〔註9〕 黃遵憲《日本國志》，《黃遵憲全集》下卷，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20頁。

〔註10〕 同上。孫民樂認為這段文字至少包含了五項信息：跨文化視域，言文分離意識，借他者眼光而看到的母語的語言文字狀況，對於語言和社會教育文化發展之關係的認識，潛在的對於語言改革的期待。參見孫民樂博士論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語言問題》（未版）。

的問題。馬建忠說，「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於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馬氏文通》於一八九八年出版，轟動一時，對後來的漢語研究，尤其是語法研究發生決定性作用，陳望道說被人「憶了萬萬千，恨了萬萬千」，但馬氏方案當時並未有助於漢語文言的讀寫問題。孫中山在一九一八年的看法能說明問題：

中國向無文法之學……以無文法之學，故不能率由直徑，以達速成。此猶渡水之無津梁舟楫，必當饒百十倍之道路也。中國之文人，亦良苦矣！自《馬氏文通》出後，中國學者，乃始知有是學。馬氏自稱積十餘年勤求探討之功而後成此書。然審其為用，不過證明中國古人之文章，無不暗合於文法，而文法之學，為中國學者求速成圖進步不可少者而已；雖足為通文者之參考印證，而不能為初學者之津梁也。繼馬氏之後所出之文法書，雖為初學而作，惜作者於此多未窺三昧，訛誤不免，切全引古人文章為證，而不及今時通用語言，仍非通曉作文者不能領略……所望吾國好學深思之士，廣搜各國最近文法之書，擇取精義，為一中國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語，而改良之也。夫有文法以規正言語，使全國習為普通知識，則由言語以知文法，由文法而進窺古人之文章，則升堂入室，易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復也。〔註11〕

孫中山以馬建忠未竟之業而寄望於後來者，但他唯矚目於語法的發明，在文字改革的大問題上還是保守的，不過他最後的幾句話，將言文一致作為改良文法的目標，明確提了出來。持此目標，激進主張隨即跟進，最早的登場者是「切音文字運動」倡導者王炳耀等人。〔註12〕他們主張用「切音文字」取代漢字，以利語言統一。一九〇三年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上書袁世凱：「中國語言一事，文字一事，已一離而不可復合矣。更兼漢字四萬餘，無字母以

〔註11〕孫中山《建國方略·以作文為證》，《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註12〕王炳耀，廣東東莞人，著《拼音字譜》；蔡錫勇，福建龍溪人，著《傳音快字》；盧懃章，福建同安人，著《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中國新字》《中華新字》等；沈學，江蘇吳縣人，著《盛世元音》；勞乃宣，浙江桐鄉人，著《等韻一得》《寧音譜》《吳音譜》等；王照，河北寧河人，著《官話合聲字母》等。

統之，學之甚難，非家計富厚、天資聰穎之人，無從問津，此億萬眾婦女與貧苦下等之人所由屏於教育之外，而國步所由愈趨愈下也。」他主張「以語言代文字，以字母記語言」。《一目了然初階》的作者盧戇章曾經說，「竊謂國之富強，基於格致，格致之興，基於男婦老幼好學識理，其所以能好學識理者，基於切音文字。……基於字話一律，則讀於口則達於心。又基於字畫簡易，則易於習認，亦即易於提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之不富強也哉！」〔註 13〕這些晚清書生的主張，正與後來的五四精英相一致。梁啟超也認為，「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中國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兼數字，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數十筆畫，則識字也難。」「文與言合，則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梁氏不會想到，後來的白話要來說清他這段話，字詞不知要多出幾倍，而且說得不清順。

蔡元培一九二〇年論及統一漢語的重要性：「爲什麼要有國語？一是對於國外的防禦；一是求國內的統一。現在世界主義日盛，似無國外防禦的必要，但我們是弱國，且有強鄰，不能不注意。國內的不統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受方言的影響……言文不一致的流弊很多。」〔註 14〕這段話，或可視為「犧牲漢字還是犧牲我們」的溫和版了。

一九二八年，中華民國大學院（原教育部）正式公佈由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等制定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吳玉章等在蘇聯設計的「拉丁化新文字」，可視作晚清切音文字運動的延續。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公佈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註 15〕，是這版本的副產品，正如煉丹術的副產品是爲豆腐，自切音字運動始，其目標始終是代替漢字，而不是爲漢字注音。

〔註 13〕 倪海曙《清末漢語拼音運動編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18 頁。

〔註 14〕 蔡元培《在國語講習所演講詞》，高平叔《蔡元培語言及文學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26 頁。

〔註 15〕 1977 年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採取漢語拼音字母作爲中國地名羅馬字母（即拉丁字母）拼寫法國際標準。1982 年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決定，採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爲文獻工作中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四

切音字母尚未結果，一些留學生開始呼籲廢除漢語，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爲首者吳稚暉，其刊物曰《新世紀》。反對者章太炎即於一九〇八年作《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劉師培亦作《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二文均刊於《國粹學報》。

章太炎早年從俞樾治小學和經學，於清代樸學大有造詣。中國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至乾嘉學派得以光大。章太炎的自信流露於致友人信中，「若乃究極語言，審定國音，整齊文字，僕於今世有一日之長，一飯之先焉。」〔註16〕對「巴黎留學生相集作《新世紀》，謂中國當廢漢文而用萬國新語」，他有專文駁詰。章太炎認爲，漢語言文字屬於象形字的表意文字系統，歐陸各國的語言文字屬於合音字的表音文字系統，「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俄國使用的也是合音文字，其識字率卻少於中國。日本使用混合文字，雜有漢字，日本人的識讀並不怎樣困難。開啓民智，提高國人識字率，關鍵在於「強迫教育之有無」，「草木形類而難分，文字形殊而易別，然諸農圃，識草木必數百種，尋常雜字，足以明民共財者，亦不逾數百字耳。」〔註17〕道理說得扼要而淺明。

劉師培曰，「今人不察，於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遠。不知中土文字之貴，惟在字形，至於字音一端，則有音無字者幾占其半。及西籍輸入，每於人名地號，逐寫漢名，則所譯之音，扞格不相合，恒在疑似之間。又數字一音，數見不鮮，恒賴字形爲區別。若捨形存音，則數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較之日人創羅馬音者，其識尤謬。知中國字音之不克行遠，則知中國文字之足以行遠者，惟恃字形。而字形足以行遠之由，則以顧形思義，可以窮原始社會之形，足備社會學家所擷摘，非東方所克私。」〔註18〕其中「知中國字音之不克行遠，則知中國文字之足以行遠者」，已將「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的道理說盡了。陳寅恪更將每一漢字視爲一部文化史，徐通鏘則斷言「認知語言學」的大

〔註16〕 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98頁。

〔註17〕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陳平原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頁。

〔註18〕 劉師培《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張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生活·讀者·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35頁。

本營是在中國，依據亦同。〔註19〕

章太炎於切音文字也有致命的批評。他說切音文字只能是注音符號，不能是一種文字。中國方言眾多，若以某一方言作標準語，依其韻、紐製成「切音字母」而拼寫漢語，大量方言勢必消失。而漢語方言是中國文化的活化石，是大量古語、古訓的堅實存證，文獻的考證與闡釋基於其上。有漢字樞紐在，方言始得雜而不亂，「故非獨他方字母不可用於域中，雖自取其韻、紐之文，省減點畫，以相拼切，其道猶困而難施。」〔註20〕

章太炎以上意見當時未遭遇反駁，甚至沒有引起討論，然而來自歐洲的一位語言學家，生前默默無聞，身後著作的影響卻非太炎先生所可比擬——太炎先生東京講學之時，索緒爾在巴黎授課。

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一八五七～一九一三年）在巴黎講授普通語言學，由學生筆記整理而成《普通語言學教程》，一九一六年出版。這是西方語言學劃時代的著作，索氏因此被譽為「結構主義語言學之父」。此書於一九六三年由高名凱譯為漢語，遲至一九八〇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但早在二十世紀初，索緒爾的結論，對中國語言學發生了巨大影響。索緒爾認為：「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後者單獨構成的。」他明確表述自己的理論「只限於表音體系，特別是只限於使用以希臘字母為原型的體系」，然而不幸的是，這一理論成為漢語語言學尊奉的信條。「一個多世紀來，我們遵循口語至上的途徑研究語言，將漢字和它所提供的信息完全排除出語言研究的範圍，強使以視覺的文字為中心的研究傳統轉入『視覺依附於聽覺』的軌道。」〔註21〕

一九〇六年六月章太炎出獄後在東京公開講學，內容三項：中國語言文字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設施之旨趣，古來人物事迹之可為法式者。聽講弟子中，

〔註19〕 陳寅恪曾稱讚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一書：「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徐通鏘語出氏著《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頁。

〔註20〕 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陳平原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4頁。

〔註21〕 徐通鏘《語言學是什麼》，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頁。

錢玄同、黃侃、朱希祖等為文字學家史學家。但太炎先生的語言文字觀卻未能發生索緒爾式的影響，這固然與學問傳播方式的差異有關。章太炎的方式是私人授徒傳統，學問思想也被視為傳統，雖有報章著述，然未能產生應有的影響。而偏信西方是當時國人的普遍心態，即使語言文字學，洋人的學說也被視為楷模。現代知識生產基本來自大學，而大學模仿西方的樣子，普遍開設語言學課程，而將中國的小學束之高閣。

尤為可歎者，乃章太炎的主張正與晚清時勢相悖，新興知識群體的口語至上和民眾崇拜喧囂聲起，言文一致的深層語法與政治走向一拍即合，一九四九年唐蘭出版《中國文字學》一書，結尾感慨道，「我們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註22〕這一傾向在其書問世之後的數十年裏愈演愈烈。

當年章太炎亦曾慨歎：「以冠帶之民，拔棄雅素，舉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族滅，九服崩離，長為臧獲，何遠之有？」〔註23〕另一位國粹派人物鄧實，說得更為分明，「故一國有一國之語言文字，其語文亡者，則其國亡；其語文存者，則其國存。語言文字者，國界種界之鴻溝，而保國保種之金城湯池也。」〔註24〕在知識和潮流的蒙蔽之下，五四一代愛國者及其後繼者，竟然自毀長城而不自知。

第二節 言文關係簡論

一

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有言：

中國自有文字以來，皆以形為主，即假借形草，亦形也，惟諧聲略有聲耳，故中國所重在形。外國文字皆以聲為主，即分篆、隸、行、草，亦聲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國之字無義不備，故極繁而條理不可及；外國之字無聲不備，故極簡而意義亦可得。蓋中國用目，外國貴耳。然聲則地球皆同，義則風俗各異，致遠之道，以聲

〔註22〕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頁。

〔註23〕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註24〕鄧實《雞鳴風雨樓獨立書：語言文字獨立》，王玉華《多元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頁。